

韩国人类学

한국 인류학 백년

◎【韩】全京秀（전경수） 著

◎崔海洋 杨洋 译

百年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韩国人类学

한국 인류학 백년

◎【韩】全京秀（전경수） 著

◎崔海洋 杨洋 译

百年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人类学百年 / (韩) 全京秀著; 崔海洋, 杨洋译.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30-3879-9

I. ①韩… II. ①全… ②崔… ③杨… III. ①人类学—科学史—研究—韩国 IV. ①Q98-09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863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5001号

KOREA KF
FOUNDATION

한국국제교류재단

The Korea Foundation has provided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undertaking of this publication project.

内容提要:

本书第一部分从韩国人类学的基础讲起,详细论述了韩国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及原著作者所理解的人类学。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韩国人类学近代性和近代化的混存、学院派人类学的出现及在人类学界活跃的学者。第三部分内容集中于人类学专门化的短暂复兴期,主要讲述了国立民族博物馆与石南、大韩人类学会、“宋锡夏”“孙晋泰”,并对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进行了讲述。第四部分介绍了韩国人类学的发展潮流,主要讲述了人类学思想的复活,现阶段韩国人类学在韩国的发展倾向、制度性的变化,外国学界的韩国研究,以及人类学方法与研究的扩张。第五部分是对韩国人类学的反省与前景的讲述。

责任编辑:王 辉

责任出版:孙婷婷

韩国人类学百年
HANGUO RENLEIXUE BAINIAN

[韩] 全京秀 著
崔海洋 杨洋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82004826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1

发行电话: 82000860 转 8101/8029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000 mm 1/16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310 千字

ISBN 978-7-5130-3879-9

网 址: <http://www.ipph.cn>

<http://www.laichushu.com>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wanghui@cniipr.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3279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24.75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6.00 元

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韩国人类学百年》

参译人员

罗康隆 阿拉坦宝力格 崔海洋
崔延虎 刘志霄 麻国庆 邵侃
田广 王建革 王晓敏 杨圣敏
杨庭硕 尹绍亭 张曦 赵敏

序

杨庭硕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韩国的主体民族为朝鲜族，朝鲜族也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更难得之处在于，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与韩国命运与共，都深受过殖民势力的欺凌和蹂躏。1842年，中国被迫接受“南京条约”，韩国也于1876年接受“江华岛条约”。1895年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45年才获得独立。其后，又备受国家分裂之苦。时至今日，韩国尚未实现国家的统一，而日美等外国势力也还在不断插手中国的台湾事务，企图抑制中国的崛起。相似的历史进程，必然给两国的学术发展打上相似的烙印，也留下了同样的创伤。

时值全京秀博士《韩国人类学百年》汉文译本付梓之际，感慨万千。兴起之余，也不免为中国人类学界的研究现状担忧。学术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以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具体到人类学而言，她虽然堪称世界范围内的“显学”，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而言，显然需要认真清理服务于本国的人类学学术思想史。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学术思想的系统清理却滞后于发展的需要。但愿中国学人能够以近邻为鉴，急起直追，不负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若就这一紧迫性社会需求而言，该书确实值得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该倡议势必涉及多达数十个的国家和地区，明确涉及的民族数以千计。而当下的中国人类学家对相关国家各民族的认识，远远不能满足落实“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资料储备不足，专门人才欠缺，学术思想亟待创新。

若就国土面积而言，韩国确属小国无疑，但作为韩国人类学会会长的全京秀博士，其学术视野却能深入到中亚、印度、阿拉伯世界，与美国和法国知名学人都能保持密切地学术交往。韩国还有不少学者长期留住东南亚、印度、印尼等地，从事长期的民族学考察。而当下的中国学人却热衷于到欧美发达国家攻读人类学学位，向往于“一带一路”沿途各国，但真正从事人类学学习和研究者却又屈指可数，这显然与崛起中的中国社会需求极不相称。

波斯文本、印第斯坦文本、阿拉伯文本有关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专著与资料出版后，数十年间，居然还未出现汉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延。《韩国人类学百年》中译本的出版，堪称一个好的开端，但其后的路还遥远得很。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人类学界，需要一大批精通阿拉伯文、印第斯坦文、波斯文、斯瓦希里文、泰文、孟加拉文、印尼文等专家。中国的人类学学人能不能急国家之所急，只能静候其表现了。

人类学是一门“显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中，人类学是作为基础课程而加以传授，中小学生都得接受人类学普及教育。但在中国，人类学往往是到了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才从头开始学习。这样的教育体制，同样与崛起中的中国不相称。相比之下，韩国的人类学教育，却能做到大致与西方相合拍。《韩国人类学百年》汉文本付梓之际，是中国学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

全京秀博士求学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与“进化学派”的领军人物斯图尔德、萨林斯、拉帕波特、塞维斯都有密切的个人交往，与法国学人列维斯特劳斯同样交往深厚，对西方人类学学术思想有精深地把握和认识。他在首尔大学任教期间，不仅系统讲授西方人类学思想史，还系统讲授“日本人类学史”和“中国人类学史”。他在编纂《韩国人类学百年》一书的同时，还编纂了《日本人类学史》。

时下的中国人类学的教学研究正面临着七大挑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亟待需要现代人类学的思想高度，加以系统地整理和评估；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亟待展拓；中国人类学家的活动范围亟待走向世界；中国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必须及时清理反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世界各国的人

类学名著亟待翻译成汉文出版，以供参考；中国人类学的普及教育亟待从基础做起；中国人类学界的内耗需要尽早平息，对西方人类学思想的极端崇拜，亟待澄清。但愿《韩国人类学百年》汉文本的出版，能为上述七大挑战的应对提供一个契机，仅此切盼国内学人的响应。

《韩国人类学百年》的翻译者崔海洋博士，除翻译该书外，还翻译过全京秀博士的《环境人类学》等其他多部著作。他与韩国同人交往频繁，了解颇深，这样的学者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太少。但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沿边各少数民族中，精通泰文、缅文、印度文、越南文、波斯文、塔吉克文、哈萨克文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为数不少。但如果他们要进入高等院校深造人类学，都得重新学英文，既不能发挥它们的特长，又浪费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正当西方人忙着学中文的时候，我们却逼他们学英文，这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立足于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不学英文无伤大雅，但中国若不拥有通晓“一带一路”沿途各国语言文字的人类学家，确实是一件大事。

中国的崛起，贵在发奋；中国的发展，贵在知己知彼。人类学正好是实现知己知彼的学术利器。此前，中国重在韬光养晦，人类学没有提到重要发展的议事日程，这情有可原。当中国初步崛起的今天，人类学将成为走向世界的先锋学科，乃是时代所使然。能否“应时而动”，关键就看人类学界的实际行动了。

祝贺全京秀博士、崔海洋博士的成功。

谨此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韩国人类学的基础.....	1
第一节 研究的范围.....	1
第二节 笔者眼中的人类学.....	2
第二章 殖民统治和韩国人类学.....	11
第一节 韩国人类学的黎明：近代性和近代化的并存.....	11
一、高义骏的文化论.....	12
二、外国人类学对韩国的关注.....	16
三、迟来的体现正统性的努力.....	17
第二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人类学知识的运用.....	19
第三节 学院派人类学的出现.....	23
一、官方派.....	24
二、在野派.....	26
三、讲坛派.....	32
四、台北帝大和京城帝大的比较.....	44
第四节 朝鲜民俗学会的综合力.....	48
第五节 活跃在人类学边缘的学者.....	54
第三章 人类学专门化的短暂复兴期：解放和战争期间.....	65
第一节 国立民族博物馆与石南.....	65

第二节 朝鲜人类学会到大韩人类学会·····	74
第三节 “宋锡夏、孙晋泰”·····	83
第四节 人类学科的始终：从“京城大学”到“国立首尔大学”·····	92
第四章 韩国人类学的发展潮流·····	100
第一节 人类学思想的复兴·····	100
第二节 朝鲜学界的动向：从“社会主义民俗学” 到“主体思想民俗学”·····	107
第三节 中国东朝鲜族的民俗学·····	130
第四节 现阶段韩国人类学的国内倾向·····	133
第五节 制度性的变化：学会与学科·····	144
第六节 外国学界的韩国研究·····	155
一、欧美·····	155
二、日本·····	163
第七节 人类学方法与研究的扩张·····	173
一、解剖学的体质人类学·····	174
二、教育人类学·····	178
三、文化看护学·····	179
四、考古学界的人类学式考古学·····	180
五、音乐人类学·····	181
六、其他领域的人类学研究·····	183
第五章 韩国人类学的反思与展望·····	185
第一节 有关既往以来“学史”类的意见·····	185
第二节 在韩国何为人类学：从分离到统合·····	193
第三节 概要和结束语·····	201

附录.....	222
附录 1 关于 19 世纪末欧美的韩国人类学研究	222
附录 2 著作目录基本数据（1946—1995 年），按作者分类.....	225
附录 3 美国大学收藏的韩国人类学关系博士论文 （1987—1995 年）	342
附录 4 日本方面的韩国研究文献目录（1966—1995 年）	347
附录 5 日本“过客会”的研究活动	356
참고문헌.....	360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 Anthropology	377
Abstract : A Proposal for the Future Korean Anthropology	379

第一章 韩国人类学的基础

第一节 研究的范围

笔者在书名中一直想要回避“学史”或“学说史”之类的用语。因为若要完成“韩国人类学史”这一课题，我们需要大量的先行准备工作，而目前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所谓的“史”，是从整体上对全部相关事件和事实进行公正而深刻的评价，所以，要整理出全面的韩国人类学史，首先要进行各部分分论的研究。举例来说，将按主题分类的研究成果从时间序列上进行分析，或者将主要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集中的整理。在缺乏这些先行准备的情况下，学史研究很容易在整体上失衡，也有可能产生偏激的结果。

本书虽然以“韩国人类学百年”为名，而不是“韩国人类学百年史”或“韩国人类学史”，却仍是尽可能以学史为目的，完成相关内容的整理。少了“史”字，笔者希望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挖掘、收集、整理近百年发生的有关韩国人类学的事件和事实，并尽量避免某一特定的理论或历史观，更客观去分析人物和相关事件。

此文中所称的“韩国人类学”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与韩国有关的人类学研究，另一方面是指韩国人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前者包含一切关于韩国的人类学研究，不论学者国籍和论著语言。后者则专指韩国本土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和韩国其他学科学者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

时间上，本书选择了人类学这一学科兴起的19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说，这是在近代学术研究范围内的人类学；空间上，本书是对朝鲜半岛、韩国人及其后代，以及韩国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空间范围扩大的可能性，主要在于对“侨胞”的人类学研究。

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百年来的韩国史是一脉相承的，但韩国人类学

至今还踏着错误的脚步。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展示部分韩国人类学史，更重要的是，作为与韩国人类学这一集团的民俗志（Ethnographic）的一部分。笔者希望以解读人类学研究的集团文化为基础，来开辟一条整理韩国人类学史的新道路。

自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发表人类学宣言以来，已有140年的历史。回顾这140年来韩国人类学发展历程，^①可以发现，韩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与西方或日本的人类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其是否有过（或有着）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过去的西方或日本学者在研究韩国的民族或文化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帝国主义的视角，而韩国的人类学界根本就没有过帝国主义的视角，目前也没有发现这一迹象。

西方和日本的人类学，在后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积累了大量自身的学术成果。而韩国的人类学则是在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受害者的立场上发展起来的。虽然韩国人类学界与他们共同讨论“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但二者的立场根本不同，然而长期以来韩国人类学界还在沿用这些西方学者创造的用语。由此看来，韩国人类学界要走的应该是“脱”后帝国主义或“脱”后殖民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这些西方学者的路，而且要彻底地由韩国人类学界自己来完成。

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应尽量摒弃自己的个人需求，不要为了满足自己而去做学问，而是选定学术问题和课题，并努力去解决相关问题和课题，这样研究的过程就是所谓学问的自我准据（文承益，1974：113）。笔者整理韩国人类学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人类学这一门学问的自我准据。

第二节 笔者眼中的人类学

随着时间的流逝，笔者越来越感到能够研究人类学是人生一大幸事，因此笔者对于直接或间接影响过作者和其他人类学前辈的老师们有着特殊

① 斯洛特金（Slotkin 1965: VII）曾说过，人类学全部的领域都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这作为学术的其中一部分在谈及人类学起源点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人类学性研究倾向的胎动。在18世纪末初次出现的ethnography这一单词对人类学性的研究倾向有着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的感激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研究人类文化的深入,笔者在这一过程中经常被人类文化的奥妙所陶醉。也更加坚信这种人类文化的奥妙可以由人类学给出合理的解释。目前,韩国学界中,哲学和科学的日益相容而对于人文学和社会学的制度性分离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现象。

学界的这种研究氛围对人类学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在制度性分离下,人类学是很难发现自我的。因此,在学者们对学术的态度转变期,韩国人类学界应趁机对韩国人类学这一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行准确的定位。笔者坚信,如果这一课题与韩国人类学发展50年来人类学界的自省相结合,50年后的韩国人类学界会创造出辉煌的研究成果。

目前,作为人类学者,首先应自省——什么是人类学?为什么要研究它?怎么去研究它?因为这些问题反映了人类学研究的特点与价值,并能划清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

为了区分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整理。笔者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的是,本书提到的一些观点,如对个别学科的特性和这些学科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的认识,只是笔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整个韩国人类学学术界。

在学科分类问题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分类方法。比如,美国把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史前人类学)四类(Bourguignon, 1996年);再如,欧洲式的分类是把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不一样的学派来进行研究。

把欧洲式的人类学用美国分类方式解读,那么欧洲的人类学指的是美国的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则指的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但最近,传统的分类方式在“文化”概念的大框架下,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分类有所调整;另一方面是两种传统的分类方式融为一体成为新的体系(如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譬如,在英国,随着“文化”概念的介入,原本被划为人类生物学的体质人类学逐渐与美国式的体质人类学相一致。

美国式的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是文化概念始终贯穿着整个学术研究,而相对来说,在欧洲,这种倾向就不那么明显。笔者一向把文化概念作为人

类学的基础，因此，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运用美国式的分类方式，再根据韩国国情对韩国人类学重新分类。

目前，韩国的体质人类学有着盲目跟从解剖学研究结果的倾向。“解剖学主要研究生物体的形态、结构，以及繁衍等问题；而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生物体的体质特征、起源以及进化过程等，因此，也可以把两者视为同一学问领域。正如解剖学里有比较解剖学，体质人类学也有着研究人种或种族之间的体质差别的分支学科。”（张信尧，1979：11）但在这一论述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文化概念介入的影子。因此，可以说体质人类学在韩国的发展形态较为畸形，而这一形态在其发源地都找不到。

众所周知，韩国考古学是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兴起的，时至今日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特点。在韩国，考古学几乎可以被称为“考古美术”学派，由此名称也可以看出，考古学也跟体质人类学一样，很难找到文化概念的踪迹，而只是着重于阐明历史年代和重塑历史。

1970年后，即便是在美国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韩国考古学者，大部分也都只是追逐着先学者的足迹。虽然他们在美国受教育的过程中重视过文化概念的影响，但回国后仍是热衷于阐明历史年代与重塑历史的工作，而不是研究忠实于文化概念的考古学。不可否认，韩国的考古学的确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且在日本殖民地时代，韩国考古学也一直延续着这一特点。

韩国民俗学在宋锡夏的手中形成了应有的形态。显然，它是在一定的文化概念介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俗学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学问”，而其主要内容是“社会民俗、经济民俗、医疗民俗、语言民俗、礼仪·宴会民俗、信仰民俗、艺术民俗等”（张哲秀，1996年）。在民俗学界，虽然这种分类方式也受到质疑，但对“民俗学是研究民族文化”的这个大方向，大家都持着同样的态度（参照李杜铉、张筹根、李光奎在1991年的研究，以及成炳禧、林在海在1986年的研究）。不难发现，韩国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在研究内容上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两个学界就出现了重叠部分。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民俗学界的一部分是从韩国人类学会中分离出来的，也曾出现过四分五裂的形势。

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一直走的是远离其本质目标的路线，而民俗学遵

循了在文化概念的基础，虽然在内容上与文化人类学保持一致，但在制度上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试着去打破这种现状，以文化概念为核心，把那些内容和目标相异的部分集中到一起进行研究，并尝试实现制度上的突破。

在人类学史中，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文化”这一概念。在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我们设定了“文化”的概念，并通过它对“性相近、习相远”^①进行了具体研究。人类学一直以来追求的本质目的在于，通过“性”的“同一性”来理解文化的普遍性，通过“习”的“相对性”来理解文化的特殊性。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者一直坚持着一个假设，即人是身体与心灵相统一的实体。

我们将研究人身体的部分称为体质人类学（或是形态人类学，最近又被称为生物人类学），研究人心灵的部分称为文化人类学。每个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把两者在制度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有的则是把两者分离分别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两者都是以统一的人类学为目标。

回首过去50年韩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两者并没有以作为整体的人类学为目标，而是独立地研究各自的领域。大韩体质人类学学会会长也曾经反省，韩国体质人类学一直被看做医科大学解剖学辅助性基础研究的一环，并指责“体质人类学越来越倾向于遗传因子和分子的研究”（李光浩，1988年）。1988年以来，大韩体质人类学所发行的《体质人类学会志》中所登载的大部分论文，都是以了解解剖学形态为目的而进行的身體测量和与其相关的数据分析，以及有关疾病症状的一些事例，只有极少数是史前人骨的测量数据和最近才实施的对中国维吾尔族与泰国少数民族人体测量的研究结果。在韩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一些解剖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到比较解剖学当中。但比较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有着明显的界限，要明确的一点是身体特征的地域性比较不是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必须包含指向文化概念的研究内容。

自称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们根本就没有朝文化人类学指向的方向

① 见《论语·公冶长》。

发展。那这其中的某些教授就能反映韩国体质人类学的现状，他们不是从解剖学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并获得体质人类学博士学位，但是与其说他们研究的是体质人类学，还不如说他们创造的是有关文化人类学的成果。然而，这不是单纯是某一个学者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人类学界还没有形成均衡发展的制度背景，没法为个人提供良好的支持，而且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缺乏正确的认知意识。

“在人类学中应把对人的关心放在首要的地位……人类学最终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的全面而科学的理解……首先要分析人类的特征……。”（金光彦，1987：69）从这一段论述来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最终是对人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回避在人的特性中最基本的、作为前提的生物性特征。

生命的整体性，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命题。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学者更要以身作则，要以行动来证明生命的整体性。但在过去的40年当中，人类学界却强制性地“试图闭上一只眼睛”，把人类学当成文化学。事实上，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则是人类学的另一个领域。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人类学界回避建立两者均衡研究的人类学体系，以至于出现了文化人类学一边倒的现象。

对于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医科大学的解剖学者把体质人类学当成是他们辅助性的工作；也有人指出是因为在现行的制度体系下人类学属于人文社会学。考虑到这些特殊性，韩国人类学难免出现向文化人类学一边倒的倾向。但笔者完全不同意以上观点，因为在这样的主张下，存在的只能是恶性循环的继续。在没有专业人士的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不安排有关的课程，这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在根本没有提供接触体质人类学机会的前提下就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

把文化概念作为基础人类学，要求无论是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最终都要指向文化概念。单单研究人形体上和体质上的特征，不是体质人类学而是解剖学。人的这种形体上、体质上的生物特征作为基础怎样影响其文化的构成，而且这种文化的构成是怎样影响人的形体、体质的特殊性，即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而这有助于实现人类学最终的目的——对人类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韩国人

类学不是指向总体性的人类学，而只是极端地立足于制度性分离下的基础性工作的一环。

众所周知，人类学这一学问是在19世纪中叶以Anthropology为名在西欧开始盛行的。韩国人类学研究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帝国主义派遣的日本御用学者开始进行的，而在同一时间段俄罗斯也对沿海州的朝鲜人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韩国最初盛行的人类学是殖民和统治的手段，可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受此余波的影响，在殖民地时代，人类学学者被派遣到京城帝国大学，而当时的京城帝国大学就是日本人研究日本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基地。

解放初，对于朝鲜人类学会（1984年改名为大韩人类学会）的诞生历程、同学会的活动，以及首尔大学文理专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人类学科的相关记录，还没有较明确的介绍。之后，以解剖学者和临床医师为中心成立了大韩体质人类学会（创立于1968年），而且这一团体至今还存在着。

1958年韩国文化人类学会的创立，使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得以立足于这片土地，而1961年首尔大学考古人类学科的设置，使得人类学成为公共教育中一门正式的学问。从1975年开始到现在，首尔大学的人类学科一直作为社会科学大学一门独立的专业而存在。

过去，首尔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科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美术学为中心课程。1975年的学科分离政策把以考古学和美术学为中心的考古美术史学科设置在人文大学，同时把人类学设置为独立的学科，但这时的人类学把中心指向了文化人类学，因此导致了体质人类学发展的极度脆弱。这种状况也存在于现在的考古美术史学科中。医科大学的解剖学教室曾研究并实践过体质人类学，因此，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首尔大学从整体上具备了人类学较完整的体系。

但自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成立后，在首尔大学没有过任何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踪迹，学问的一部分面临着即将灭亡的危机。虽然也曾有过在自然状态下灭亡的学问，但我们的体质人类学所面临的灭亡是由于学界对它的回避、抛弃，这与当今世界人类学发展的趋势是相违背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共同的步调发展，同时促进考古学的发展，这才是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总趋势。因此，笔者认为，在首尔大学，或是在韩国的某一大